

中国教育性别差异的经济学研究评述*

郑磊¹ 张鼎权²

(1.2.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北京 100875)

关键词: 性别不平等, 教育获得, 教育成就, 劳动力市场

摘要: 增加女性教育投资水平和质量, 缩小教育性别差异, 具有重要的经济和社会价值。尽管中国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教育性别差异, 但是女性在更高层次教育的入学机会、辍学风险、教育质量以及劳动力市场回报等教育获得和教育成就的指标上仍然落后于男性, 教育性别差异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本文在介绍了教育性别不平等研究框架之后, 基于经济学的视角, 从教育机会获得、教育学术成就、教育与劳动力市场回报三个方面对国内外有关中国教育性别差异的研究进行了综述, 解释了中国教育性别不平等的变动趋势和原因, 并对今后的研究进行了展望。

中图分类号: G40

文献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4-2563(2013)02-0112-08

Economic Analysis of Gender Inequalities in Education in China

ZHENG Lei¹ ZHANG Ding-quan²

(1.2.Faculty of Education a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Key words: gender inequality, educational attainment,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labor market

Abstracts: A growing body of literature indicates the potential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of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in female and in narrowing gender gaps in education. After six decades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gender inequalities in education have narrowed to a certain degree. However, women are still under-represented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underpaid in labor market compared to their male counterpart. Based on a framework of gender inequality in education proposed by ADB, this paper reviews the trends of gender inequality in education in China in three aspects: gender differences in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educational performance, and economic returns in labor markets. In each aspect, potential factors that can influence the rise or fall of gender gap are explained in details. Finally, this paper proposes several directions for future investigations.

一、引言

消除教育性别不平等^①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之一。中国政府颁布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提出:“保障妇女平等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受教育程度持续提高。”日前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也提出要

大力促进社会性别平等。尽管随着中国教育总体水平的不断提高,义务教育入学率上的性别差距不断缩小,但是随着教育层次的提高,男性和女性的入学率差距仍然很大,在成为文盲的可能性、残疾儿童接受特殊教育的可能性等指标上,女性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农村妇女的扫盲教育、义务教育

作者简介: 1.郑磊(1980-),男,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讲师。研究方向:教育不平等、教育与社会发展。2.张鼎权(1976-),男,教育部小学校长培训中心暨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培训学院办公室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1YJC880168)以及2010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教育获得与教育成就的性别差异:经济学的分析视角”的部分研究成果。

①教育性别差异(educational gender difference)、教育性别不平等(educational gender inequality)以及教育性别分层(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by sex)等几个名词在本文中不做区分。相对于“教育性别不公平”(educational gender inequity)而言,前述几个名词更侧重于强调客观上的教育性别差距(educational gender gap)。

阶段女童的失学或辍学、高中阶段女生的入学率、高等教育阶段女生的专业选择^{[1]P13}以及家庭的教育投资和教育回报等方面,仍然存在比较明显的性别差异。按照联合国的统计,2009年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世界排名第92位,性别相关发展指数(GDI)排名第75位,性别赋权度量(GEM)排名第72位,2011年中国的性别不平等指数(GII)排名第35位。^{[2]P3}因此,中国的教育性别差异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值得关注的问题。

和其他教育公平问题相比,教育性别差异具有特殊的复杂性。这首先体现在对教育性别差异的度量上。根据不同的指标,教育性别差异表现出不同的趋势。中国在缩小教育性别差异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比如基础教育入学率上的性别差异不断缩小,年轻一代女性受教育程度显著提高等。但是女性也面临更高的辍学、复读风险,女性整体受教育水平仍然低于男性。此外,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还存在明显的地区、民族和阶层特征,异质性很高。值得注意的是,女性的在校成绩(学术表现)高于男性,但是毕业后的劳动力市场回报却低于男性。女性在利用教育来提高生活质量、改善生活机会的可能性和回报上仍然低于男性。其次,教育性别差异的影响因素也很复杂。个体的生理特征会影响教育成就(比如成绩)的性别差异,教育、劳动力市场以及其他社会发展政策、制度安排也会影响教育获得和教育成就的差异,而传统习俗以及由此导致的家庭偏好(比如婚姻匹配、养儿防老等)同样会影响教育获得和教育成就。因此,教育性别差异不仅受到教育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政策影响,也受到家庭决策影响,而且在本质上说,后者的影响更大。

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教育性别差异的现状以及变化趋势的原因,并基于此明晰未来政策的努力方向,本文从经济学视角对近年来有关中国教育性别差异方面的研究——特别是量化研究——进行了综述。在介绍了一个用于研究教育性别不平等的分析框架之后,本文从教育机会获得、教育学术成就、教育与改善生活机会(特别是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三个方面对教育性别不平等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回顾,重点在于解释影响中国教育性别不平等的原因,并对这一主题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二、教育性别不平等的分析框架

亚洲开发银行曾经提出了一个用于研究教育不平等的框架。该机构将教育不平等指标分成与性别相关的、与收入相关的、与地区相关的以及与社会文化相关的四个维度。具体到与性别相关的教育不平等,又包括三个方面:各级教育获得情况上的性别差异,在教育上取得成功的机会的性别差异,利用教育来改变生活机会的可能性的性别差异。^{[4]P16}这三个方面组成了教育性别不平等的研究客体——什么方面上

的不平等。

对于第一个维度,通常用各级教育的入学率、平均受教育年限、不同受教育层次的人口比例等指标度量。对于第二个维度,可以用各级教育的升学率(特别是升入高中阶段和大学阶段的升学率)、在校学业成绩和学术表现等指标度量。对于第三个维度,体现了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赋权工具(empowerment),可以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个人未来的生活质量与生活机会。一方面,教育通过影响认知能力,“提升了女性的质疑能力、对所处地位的反应和行动能力,并提高她们获取信息的能力,从而扩展了女性的自由”。^{[6]P91}另一方面,教育直接影响了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和收入状况。^[7]因此,针对第三个维度,可以从教育投资收益率的性别差异、职业获得的性别隔离、教育与女性政治参与率等方面度量。

在目前国内的研究中,教育学领域的相关文献主要侧重于前两个维度,也即关注入学机会、学习成绩、学术成就上的性别差异。而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的学者对第三个维度也投入了巨大的热情,他们尤其感兴趣的是,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赋权工具,是否起到了改善女性生活质量、增进生活机会的作用?特别是就社会学而言,性别本身就是影响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社会学专门从“性别分层”(sex/gender stratification)这个角度来解释教育、职业、社会地位等方面的性别差异。

无独有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每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从2010年开始正式发布性别不平等指数(GII),该指标是对以往的性别相关发展指数(GDI)和性别赋权度量(GEM)的改进。该指数将受教育程度和议会席位中女性代表比例都纳入到“赋权”这一测量维度下,此外还包括生殖健康和劳动力市场两个测量维度。这一新的计算方法“承认了各维度间是互补的,并且学校教育的不平等往往与——比方说——工作机会的获取以及产妇死亡率相关”。^{[9]P30}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提出了促进妇女发展的几个重要领域。其中,妇女与教育、妇女与健康、妇女与经济、妇女参与决策与管理等方面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女性的教育发展密切相关。根据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具有提高经济和健康水平、降低生育率、增加社会参与程度的外溢效应。这些外溢效应都体现了教育作为一种赋权工具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由此可见,要全面的衡量教育上的性别不平等,不仅要考察起点上的机会不平等,更重要的是要了解教育作为一种赋权工具所产生的结果上的不平等。正如本文后面将要阐释的那样,研究教育的性别不平等需要在一个供给和需求相联系、成本和收益相统一的权衡与反馈机制下进行考虑。由于教育具有经济回报和社会赋权的双重效益,^{[8]P25}因此第三个

维度上的教育性别差异直接影响到第一个维度的教育机会获得和第二个维度的教育学术表现。

三、中国教育性别不平等的研究进展

根据前述教育性别不平等的研究客体,关于中国教育性别不平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类:一是关于全国总体教育性别差异情况的研究,特别是教育获得机会上的差异;二是关于大学专业选择和各教育阶段学业成绩上的性别差异的研究;三是关于教育收益率性别差异、职业性别分割等有关教育与赋权的研究。这基本对应于亚洲开发银行提出的研究框架。

对于每一种教育性别不平等的研究客体,我们首先要了解其现状和变化趋势,其次要解释造成这种变化趋势的原因。总体而言,目前相关研究以描述教育性别不平等现状和趋势居多,探究其成因的相对较少。在前一类研究中,多数研究以个别时点的数据进行分析,利用长期的、连续性的数据进行历史变化趋势研究的较少。本文接下来在简单回顾有关现状和变化趋势的研究基础上,重点讨论影响教育性别差异的原因,这既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也是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的地方。

(一)教育性别不平等的总体情况

1.现状与变化趋势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女性的教育水平有了显著提高,教育性别差异不断缩小。特别是改革开放的30多年来,教育上的性别不平等进一步减少,在有些指标上,女性的教育发展水平甚至超过了男性。美国宾州大学社会学教授韩怡梅等人(Emily Hannum et al.)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CHNS)的研究发现,1989年,12-18岁人口入学率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当时男性的平均入学率为61.0%,而女性为57.6%。到了2000年的时候,男性平均入学率为76.4%,女性为73.9%,两者之间不具有显著差异。1989年12-18岁男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0年,女性为6.6年;到了2000年,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性别差异有所逆转——男性为8.1年,女性为8.2年。^[9]康内利和郑真真(Connelly and Zheng Zhenzhen)利用1990年和2000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同样发现,10年之间中国10-18岁人口的入学率性别差异有了极大的缩小,特别是农村地区女童的入学率有了惊人的提高,而城市地区的女性入学率甚至超过了男性。^[10]

但是教育性别差异仍然体现在其他一些方面,例如农村妇女扫盲、义务教育阶段的女童失学和辍学率偏高、中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性别选择差异明显、大学阶段女性专业选择等。^[11]尤其重要的是,当城市地区的教育性别差异逐渐缩小甚至逆转的时候,农村地区的教育性别差异仍然存在。农村女性在入学注册率和毕业率等方面显著低于男性,^[11]

女性文盲人口约为男性文盲人口的两倍多,教育性别差异在西部农村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7]随着教育层次的提高,教育性别差异越来越明显,而且这种性别差异更多的体现为城乡的差异,而不是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异。^[12]方长春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初等教育中的性别差异基本消失,但在中等教育层次存在着较大的性别差异,并且缩小趋势相当缓慢,高等教育的性别差异缩小趋势较快,但是女性更多地是接受较低层次的高等教育。^[13]此外,女性在利用教育改变生活机会(life chances)、提高生活质量上的可能性仍然低于男性,比如广泛存在的女性就业歧视、女性社会政治参与率偏低等。^[14]

2.影响因素

由于教育机会获得上的不平等直接影响到学术表现以及未来生活机会上的不平等,因此理解影响教育机会性别差异的原因异常重要。国内相关研究主要从社会性别歧视、性别刻板印象等社会、文化因素解释了教育机会获得上的性别差异。

来自经济学的研究表明,通过普及型的教育扩展政策有助于促进教育机会上的性别平等,但是仅仅依靠教育系统的政策、制度还不足以缩小教育机会性别不平等。因为影响教育机会性别不平等的原因是如此复杂多样,它与个人的、家庭的、社会的因素有关,同时也与文化的、人口的、经济的因素有关。

宏观的经济发展是否会缩小教育性别差异?对此有两种理论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15](PP275-298)}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 theory)认为,随着工业化进程和经济不断增长,性别不平等将会减小。而另一种所谓的“发展过程中的女性”(women in development)理论则认为,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将扩大性别差异,因为男性相对而言更能从改善的经济环境和发展机会中受益。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教育政策一直在追求效率和促进公平之间摇摆,^[9]因此教育性别不平等的变动趋势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不同时期政府政策关注重点的影响。例如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谢宇教授和韩怡梅(Xie Yu and Hannum)发现,在政府强调经济增长的时期,教育性别分层有所加剧;在政府政策目标以追求生活公平为主的时期,教育性别不平等有所缩小。^{[16](PP73-98)}韩怡梅的另一项研究发现,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尽管中国的市场化转型改善了家庭经济条件,从而有利于女童的教育机会,但是教育性别不平等并没有随着市场化进程而缩小,这一结论支持了“发展过程中的女性”理论。^{[15](PP275-298)}这就意味着教育性别不平等并不是一个随着蛋糕做大就会缓解的自发过程,必须采取相应的公共政策来弥补。

最近的研究——主要是经济学的——提出了一个新的

解释视角,也即从宏观的人口变化趋势出发,探讨其引发的微观的家庭内部资源分配模式变化对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一些研究表明,相对于男性而言,家庭背景对女性教育获得的影响更大。^{[17](FP60-82)(18)(19)}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当男女面对相同的甚至更加偏向于女性的教育发展政策时,如果仍然存在着各种形式的教育机会上的性别不平等,那么我们需要从家庭层面寻找其原因。如果说教育的社会阶层不平等、地区不平等更多地体现了不同家庭之间某种特质上的差异,那么教育性别不平等则更可能源自家庭内部在不同性别子女之间的资源分配差异。

家庭内部资源分配模式会对不同性别的子女的教育获得产生不同的影响,其直接原因来自家庭所面临的预算约束。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贝克尔教授提出的“孩子数量和质量权衡理论”认为,在有限的家庭资源约束下,父母生育的孩子数量越多,每个孩子能够分配的用于人力资本投资的家庭资源就越少,从而平均来看,孩子的质量(用教育获得水平或健康水平来衡量)就越低。^{[20](FP279-288)}加上中国传统的男孩偏好,这种资源约束下的教育投资模式对大家庭中的女孩尤其不利。^{[21](FP3-30)}而中国自改革开放开始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直接改变了家庭规模,从而有可能对家中不同性别的孩子的受教育水平产生影响。相关研究的确发现,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家庭生育数量下降,家庭规模缩小,这间接提高了家中女孩的受教育水平。^{[22](FP74-92)(23)(FP223-243)(24)}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发现是,在家庭内部资源分配模式中,母亲(或女性)的影响对女孩受教育的作用更大。比如一项对甘肃省的研究发现,母亲的性别偏好和家庭中女童的教育激励期望密切相关,特别是对于那些持传统性别偏见的母亲而言更是如此,这种性别观念会影响到子女将来的教育发展过程。^{[25](FP131-157)}此外,简单的以增加家庭总收入为目标的扶贫政策也许并不能有效地改善女性的教育水平等福利地位。例如钱楠筠(Nancy Qian)针对中国的研究发现,家庭总收入的上升并不能显著提高女孩存活率和受教育水平,但是女性相对于男性的收入增加则对女孩的福利有积极的影响。^{[26](FP1251-1285)}这就意味着夫妻双方对家庭内部资源分配决策是分别做出的,决策主导权取决于各自的经济地位。在涉及家中女孩教育投资决策时,妻子的决策更具主导作用。^[27]这些发现都表明,要想提高女童受教育水平,关键要提高其母亲的教育水平,教育的这种代际传递效应在女性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

(二)学术表现上的性别差异

1. 现状与变化趋势

学术表现上^②的性别差异往往是造成未来收入上的性别

差异的重要原因。由于此类研究需要标准化的测试成绩、大学录取信息等,国内相应的研究数量较少。已有研究基本都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存在的“男孩危机”(boy crisis)现象类似,中国的女性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学业成绩往往优于男性,但是在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特别是专业选择上,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性别“分割”。

一项利用北京市7235名中学生样本的研究发现,女生在整个基础教育阶段的成绩都优于男生,并且男生在中学的辍学率要高于女生,女生的这种领先优势比美国同类研究表现得更加明显,而造成这种性别差异的最主要原因是小学阶段的初始成绩差异。^[28]郭丛斌、曾满超和丁小浩发现,理工类高校男生比例过高是造成总体上高等教育机会性别差异大的重要原因,这种差异在农村地区尤其明显。女生的在校成绩优于男生,但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起薪却低于男性。^{[29](FP383-399)}这意味着教育作为一种改善生活质量的赋权工具,对于女性而言发挥的作用较小。陆根书、刘珊、钟宇平针对10909名高中生的研究发现,高中生的高等教育需求性别差异不大,但是专业选择存在较大的差异,其中性别角色、家庭收入水平和教育期望是影响专业选择性别差异的重要因素。^[30]文东茅基于1998年和2003年两次全国高校毕业生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男女学生在大学期间学业成绩并无显著差异。^[31]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岳昌君利用更新的2009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数据发现,女生在大学阶段的学业表现优于男生,但是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特别是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上少于男生。^[32]

2. 影响因素

对于学术表现上的性别差异,国内已有研究主要基于教育社会学视角和女性主义理论,从课堂教学过程和教材使用等方面对此加以解释。^{[33](34)(35)(36)}针对越来越明显的中国女生在基础教育阶段的优异表现,有研究认为,这归因于父母更关注女孩的教育、女生的非认知能力优于男生、现有的以应试教育为导向的教育模式更适合女生的发挥等。^[34]此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影响因素就是社会规范(social norms)以及母亲有关性别角色态度的代际传递。在这一点上,国外的一项最新研究具有启示意义。在这项针对2009年PISA成绩分析的研究中,学者发现,虽然从全球范围来看女生在数学测试中逊于男生,在语文测试中优于男生,但是在那些性别平等程度较高的社会,女生在两个项目上的表现都领先于男生。而母亲有关性别角色的态度会显著影响女生——而非男生——的成绩,在母亲外出工作的家庭中,女生的测试成绩表现得更好。^[37]这一结论再次表明,提高母亲(女性)的教育水平具有明显的代际效应。

^②此类文献所说的学术表现(academic performance)既指学业成绩,也包括大学阶段的专业选择。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观察到的成绩上的性别差异可能仅仅是教师的原因造成的。比如前述利用北京市中学生样本的研究发现,在所考察的三种测试成绩中,初中第五学期期末测试以及中学毕业考试上的成绩性别差异相对较小,而高中入学考试成绩上的性别差异较大。这是因为前两种考试在阅卷的时候并不匿名,因此教师会无意识地提高男生和女生各自相对较弱的学科的分數——对于男生而言,会在语文、英语科目上给出更高的分數,对于女生而言,会在数学、物理等科目上给出更高的分數。而第三种考试是匿名阅卷,因此表现出更明显的成绩上的性别差异——男生的数学、物理成绩更高,女生的语文成绩更高。^[29]如果其他研究进一步支持这一发现的话,这就意味着我们观察到的学术表现上的性别差异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性别不平等。

上述发现反映了国外同类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基于学生和教师之间的互动关系来解释学术表现上的性别差异。在这种师生互动关系中,教师的性别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教师的性别通过性别角色模型、自我实现理论等机制影响到学生的学术表现。如果教师的性别和学生本人相同,那么这将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教师对学生成绩的主观感知以及学生本人的学习努力程度,^{[38](PP529-554)}并且提高学生修完课程的概率。^[39]但是也有研究质疑了同性教师有助于提高成绩这一假说,因为不同性别的教师倾向于选择教授不同的科目,这就导致教师和学生的匹配是非随机的。^{[40](PP37-53)}不管怎样,这些国外研究从解释视角和研究方法上都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三)教育收益率、工资与职业获得等方面的性别差异

1.现状与变化趋势

教育是个人获得收入、职业、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影响因素。教育能否作为一种赋权工具发挥改善生活质量、提高生活机会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不同性别的教育机会获得、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或者说,教育对结果的影响——表现为各种工具性收益——反过来会决定初始的教育机会获得。下面我们就以教育收益率和职业地位获得为代表介绍这方面的教育性别差异状况。

大部分关于教育收益率性别差异的研究表明,女性的教育收益率高于男性。^{[41][42][43](PP730-752)[44][45]}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女性教育收益率可能更高,但男性的工资仍然高于女性。^[52]对此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教育对女性不仅具有直接提高生产力从而提高工资的作用,还具有降低劳动力市场歧视的间接收益。如果考虑了教育的这一作用,教育收益率的性别差异将完全消失。^[46]

在职业获得上也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李实和马欣欣发现,20世纪90年代后期城市劳动力市场存在一定的职业性

别分割。^[47]李春玲发现1982年到1990年期间的职业性别隔离指数不断上升,而1990年到2005年间该指数有所下降。^[48]^[49]岳昌君利用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女生在就业落实率、起薪水平和就业满意度上低于男生。并且男生和女生在就业的行业类型、产业分布以及单位类型上存在较为明显的性别分割。男生在第二产业、国有企业、国家机关就业的比例更高,而女生在第三产业、私营企业、事业单位的就业比例较高。^[52]

2.影响因素

造成教育收益率以及职业获得上的性别差异的原因很多。一个常见解释是,这是因为社会性别歧视造成的结果,特别是在父权制社会,由男性控制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对女性产生了歧视。比如有研究发现,生产率上的性别差异只能解释中国的工资性别差异的一小部分,而歧视仍然是一个主要原因,^{[49](PP587-603)}职业内的性别歧视是职业所导致的男女工资差异的最主要原因。^[47]针对中国城市地区就业和收入上的性别差异的另一项研究发现,女性在人力资本上的相对劣势并不足以解释就业和工资性别差异,关键原因在于市场对已婚和已生育的女性产生了各种歧视。^{[53](PP1529-1560)}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教育在缩小工资性别差异上没有作用。有研究表明,教育水平的提高可以有效地降低女性面临的市场歧视,并进而缩小工资性别差距。^{[45][46]}

另一方面,这种市场歧视又随着经济转型进程表现出不同的影响。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实行的平均主义要求对具有相同生产率的男性和女性支付相同的报酬,因此工资和职业上的性别差异并不明显。但是经济转型要求工资应该等于个人的技能,市场付出要有所回报。由于男女先天的在某些技能上存在差异,加之转型之后的雇佣和薪酬制度更多地是由微观经济主体作出决策,因此性别差异有可能会扩大。^[49]^(PP587-603)前面提到过的现代化理论和“发展过程中的女性”理论就是关于教育和职业地位获得上的性别分层的两种理论解释。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人均GDP越高、第一产业产值比重越低、非国有单位就业比重越高——这些都是表明市场化程度、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标志——职业性别隔离程度越高,^{[49](PP67)}这似乎是支持了“发展过程中的女性”理论,也即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不利于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改善。但是现代化理论也同样获得经验证据的支持。稍早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在经济转型时期,各个地区的女性相对于男性的工资比率都在上升,并且经济改革步伐越快的地区,女性相对于男性的工资比率越高,这种工资性别差异可以由分权化的工资决定模式得到解释。^{[49](PP587-603)}

关于工资和职业性别差异的原因,学者还提出了其他不同的解释。一种原因是在现代社会,适合女性的“女性工作”

例如教师、文秘等职位的增长速度较慢,而适合男性的企业工作增长较快,这也是造成男女毕业生就业机会和就业结果差异的原因。^[31]另一种原因可能来自女性自身对自己的评价出现了偏差。经济学家 Bagues 等人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招聘委员会中女性主考官的比例越高,越不利于女性求职者的最终胜出,因为女性主考官会倾向于高估男性求职者的能力。^{[51][PP1301-1328]}但是不管是社会歧视也好、自我选择也罢,提升女性的教育水平都能有效地提高女性的劳动力配置能力,缩小工资和职业上的性别隔离。

四、未来研究展望

有关教育机会获得、教育学术表现、工资与职业获得等三个方面的教育性别不平等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根据前面的文献回顾,未来的相关研究有可能在以下几个方面加深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首先,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为我们解释教育机会获得上的性别差距变化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计划生育政策这一独特的自然实验工具有可能通过两种机制影响到教育获得上的性别差异。其一,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生育率下降、家庭规模缩小有可能缓解家庭面临的预算约束,从而有利于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特别是女孩的教育机会将获得更大的改善。尽管已经有一些研究表明,人口政策导致的生育率下降是造成教育性别差距缩小的重要因素,但是同样也有学者提供了反对的证据。^{[16][PP73-98][52]}对此我们还需要提供更多的经验研究以加深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其二,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出生性别比异常偏高意味着女性相对男性更加稀缺,按照经济学的假设,这无疑将会提高女性将来在婚姻市场上的讨价还价力量。因此,传统的男孩偏好可能会随之改变,这将有利于女孩的受教育状况并进而影响到教育性别差距。尽管已经有研究探讨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社会、经济后果,但专门将出生性别比与教育性别不平等联系起来的研究尚不多见。

其次,准确的解释教育机会获得上的性别差距变动趋势还需要与婚姻模式、养老模式等社会结构变化联系起来,这也是研究计划生育政策对教育性别不平等的影响时所必须考虑的两点因素。父母在子女身上进行教育投资,其中两个重要的收益就是可以提高孩子未来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或者提高父母未来的养老收益。因此子女的教育投资决策是和婚姻关系、社会保障政策的变化相联系的。孙志军曾经从“养儿防老”、“匹配婚姻”的角度对教育性别差异进行了解释,但后续的相关研究并不多见。^[53]2011年哥伦比亚大学魏尚进教授等人的一项最新研究对我们深入了解这一主题

具有启示意义。他们发现,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偏高可以解释中国持续增加的储蓄率。育有男孩的父母为了提高儿子今后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会竞相增加储蓄。^{[54][PP511-564]}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推论,这种“竞争性储蓄动机”结合目前中国房地产改革所引起的“婚姻财政”关系变化,^③父母传统的男孩偏好有可能因此随之改变,而这会进一步影响到对女孩的教育投资。弗朗西斯(Francis)关于中国台湾省的经验研究证明了这一点。他发现,1949年国共内战后赴台人员急剧增加,这引起了岛内人口性别比上升。这一事件的连锁反应就是,男性相对女性较多导致结婚的彩礼比嫁妆更昂贵,因此父母更偏好生育女孩,家中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有所增加。^{[55][PP813-837]}

第三,我们还需要进一步了解教育获得机会和教育成就(既包括学业成就,也包括教育对生活质量的影响)之间的互动机制,特别是预期的教育成就是否会影响到初始的家庭教育投资机会,从而造成教育性别差异。教育获得体现的是起点上的可能性,是否让女性接受教育,是否让其接受好的教育,这直接关系到教育成就——在校成绩和将来的教育收益。反过来,教育成就的性别差异又会影响到教育获得的家庭决策和政策设计。如果女性的在校成绩高于男性,但是劳动力市场回报却低于男性,这显然会打击家庭对女童的教育投资意愿。如果劳动力市场回报的性别差异仅仅是制度性歧视所致,那么反歧视性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将促进教育获得的性别平等。目前,仅有李宏彬和张俊森的两项研究直接检验了未来劳动力市场上的教育红利以及性别教育红利对不同性别子女教育投资的影响,^{[27][56]}这无疑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对文献的回顾表明,中国的教育性别不平等是一个复杂的、动态变化的现象,缩小教育性别差异,提高女性的教育获得程度,将会产生巨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价值。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对降低生育率、促进女性以及整个家庭的社会生活参与程度、提高子女健康和教育水平、降低犯罪率等都具有积极影响。因此,为了更好地制定旨在促进女性教育获得的政策,就需要对制约女性教育获得的因素进行深入研究,判断到底是供给不足所致(比如教育普及覆盖面仍然不够),还是需求乏力所致(比如家庭更加偏好让男孩接受教育),这样才能制定出合理的政策。相关研究告诉我们,仅仅采取普及型的教育供给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缩小这种不平等。我们必须结合人口变化趋势、社会保障政策等其他社会结构的变化来综合考虑这一问题,统筹教育、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将是一条合理的应对途径。

③婚姻财政系指婚嫁时男方支付的彩礼与女方支付的嫁妆。婚姻市场供需力量的变化会影响彩礼与嫁妆的相对数量。目前民间所谓的“生儿子是建设银行,生女儿是招商银行”就是对这一说法的形象解释。

[参考文献]

- [1]郭冬生.改革开放 30 年我国妇女教育发展总报告[A].莫文秀主编.中国妇女教育发展报告:1978- 2008[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 [2]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09 年人类发展报告[R].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
- [3]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1 年人类发展报告[EB/OL].[2012- 03- 28] <http://hdr.undp.org/en/reports/global/hdr2011/>
- [4]Asian Development Bank. Framework and Criteria for the Appraisal and Socioeconomic Justification of Education Projects[R]. Manila: ADB, 1994.
- [5]转引自 Lee W. O. *Equity and Access to Education: Themes, Tensions, and Policies*[M].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nd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Centre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2.
- [6]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10 年人类发展报告[R].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
- [7]连鹏灵,郑真真.教育的性别差异[A].蔡昉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No.5:人口转变与教育发展[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 [8]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 中国:社会性别差异与扶贫研究报告[R].2007.
- [9]Hannum, E., J. Behrman, M. Wang, and J. Liu. Education in the Reform Era[A]. in Loren Brandt and Thomas Rawski eds. *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10]Connely, R., and Z. Zheng. Enrollment and Graduation Patterns as China's Reforms Deepen, 1990- 2000[A]. in Hannum E. and Park A. eds. *Education and Reform in China*[C]. London:Routledge, 2007.
- [11]Connely, R., and Z. Zheng. Determinants of School Enrollment and Completion of 10 to 18 Year olds in China[J].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2003,(22).
- [12]傅家荣.构建和谐社会——从中国教育的性别公平视角分析[J].社会经济体制比较,2007(4).
- [13]方长春.从 GPI 看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性别差异[J].妇女研究论丛,2009,(1).
- [14]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人类发展报告 2005:追求公平的人类发展[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 [15]Hannum E.. Market Transition, Educational Disparities, and Family Strategies in Rural China: New Evidence on Gender Stratification and Development[J]. *Demography*, 2005,42(2).
- [16]Hannum, E., and Y. Xie. Trends in Educational Gender Inequality in China: 1949- 1985[J].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1994, (13).
- [17]Deborah D., P. Landry, Y. Peng, J. Xiao. Gendered Pathways to Rural Schooling: The Interplay of Wealth and Local Institutions[J]. *China Quarterly*, 2007,(189).
- [18]刘泽云.农村儿童为何失学——基于多层模型的经验研究[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7,(2).
- [19]李春玲.教育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家庭背景对男性和女性教育地位获得的影响[J].妇女研究论丛,2009,(1).
- [20]Becker G. S and H. G. Lewis.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Children[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3,81(2).
- [21]Wang W.. Son Preference and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of Children in China——“I Wish You Were a Boy!”[J]. *Gender Issues*, 2005 (Spring).
- [22]Tsui M., and L. Rich. The Only Child and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for Girls in Urban China[J]. *Gender and Society*, 2002,16(1).
- [23]Li Hongbin, J. Zhang, and Y. Zhu. The Quantity- Quality Trade- Off of Children in a Developing Country: Identification Using Chinese Twins[J]. *Demography*, 2008,45(1).
- [24]Lee Ming- Hsuan. The One- Child Policy and Gender Equality in Education in China: Evidence from Household Data[J]. *Journal of Family Economic Issues*, 2011,(32).
- [25]Zhang Y., G. Kao, and E. Hannum. Do Mothers in Rural China Practice Gender Equality in Educational Aspirations for Their Children [J].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2007,51(2).
- [26]Qian Nancy. Missing Women and the Price of Tea in China: The Effect of Sex- Specific Earnings on Sex Imbalance[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8,123(3).

- [27]李宏彬,张俊森.对子女人力资本的直接投资[A].李宏彬,张俊森主编.中国人力资本投资与回报[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28]Lai F.. Are Boys Left Behind? The Evolution of the Gender Achievement Gap in Beijing's Middle Schools[J].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2010,(29).
- [29]郭丛斌,曾满超,丁小浩.中国高校理工类学生教育及就业状况的性别差异[J].高等教育研究,2007,(11).
- [30]陆根书,刘珊,钟宇平.高等教育需求及专业选择中的性别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09,(10).
- [31]文东茅.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学业及就业的性别比较[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5,(5).
- [32]岳昌君.高等教育与就业的性别比较[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0,(6).
- [33]郑新蓉.男女大学生学术能力的性别差异研究[J].妇女研究论丛,2000,(2).
- [34]郑新蓉.性别与教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
- [35]史静寰.教材中的性别问题研究[J].妇女研究论丛,2001,(1).
- [36]史静寰.教材与教学——影响学生性别观念及行为的重要媒介[J].妇女研究论丛,2002,(2).
- [37]de San Roman, A. G., and S. de la Rica G.. Gender Gaps in PISA Test Scores: The Impact of Social Norms and the Mother's Transmission of Role Attitudes[R]. IZA Discussion Paper, 2012, No.6338.
- [38]Dee T.. Teachers and the Gender Gaps in Student Achievement[J].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007,42(3).
- [39]Hoffman, F. and P. Oreopoulos. A Professor Like Me: The Influence of Instructor Gender on College Achievement[R]. NBER working paper, 2007, No.13182.
- [40]Holmlund, H., and K. Sund. Is the Gender Gap in School Performance Affected by the Sex of the Teacher?[J]. *Labour Economics*, 2008,(15).
- [41]陈良焜,鞠高升.教育明瑟收益率性别差异的实证分析[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4,(3).
- [42]侯风云.中国城镇人力资本收益率研究[J].山东大学学报,2005,(2).
- [43]Zhang, J., Y. Zhao, A. Park, and X. Song. Economic Returns to Schooling in Urban China[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5,33(4).
- [44]刘泽云.女性教育收益为何高于男性——基于工资性别歧视的分析[J].经济科学,2008,(2).
- [45]彭竞.高等教育回报率与工资的性别差异[J].人口与经济,2011,(4).
- [46]黄志岭,姚先国.教育回报率的性别差异研究[J].世界经济,2009,(7).
- [47]李实,马欣欣.中国城镇职工的性别工资差异与职业分割的经验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6,(5).
- [48]李春玲.职业、行业和单位的性别隔离[A].李春玲,石秀印,杨旻主编.性别分层与劳动力市场[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 [49]Ng, Y. C.. Economic Development, Human Capital, and Gender Earnings Differentials in China [J].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2004,(23).
- [50]Zhang, Y., E. Hannum, and M. Wang. Gender- based Employment and Income Differences in Urban China: Considering the Contributions of Marriage and Parenthood[J]. *Social Forces*, 2008,86(4).
- [51]Bagues, M. F. and B. Esteve- Volart. Can Gender Parity Break the Glass Ceiling: Evidence from a Repeated Randomized Experiment[J]. *Review of Economics Studies*, 2010,(77).
- [52]Qian N.. Quantity- Quality and the One Child Policy: The Only- Child Disadvantage in School Enrollment in Rural China[R]. NBER working paper, 2009, No.14973.
- [53]孙志军.中国农村的教育成本、收益与家庭教育决策[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 [54]Wei Shangjin and Xiaobo Zhang. The Competitive Savings Motive: Evidence from Rising Sex Ratios and Savings Rates in China[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1,119(3).
- [55]Francis, A. M.. Sex Ratios and the Red Dragon: Us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to Explore the Sex Ratio on Women and Children in Taiwan[J].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011,(24).
- [56]李宏彬,张俊森.子女受教育年限[A].李宏彬,张俊森主编.中国人力资本投资与回报[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 迎红